

学习“实践论”

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

552
060.2
53

王 众 音 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學習“實踐論”

哲學學習筆記

王眾音 作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濟南駐軍印刷廠印刷 山東省新华書店發

※

書號：1907

開本787×1092公厘1/32，印張2，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2次

印數：9,001—29,000

統一書號： 2099.27

定 价：（6）0.18元

再版前言

現在全省正在掀起一个羣众性的学习哲学的运动，特别是学习毛澤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运动。这个小册子的重印，正好可以对初学的同志，尽一点帮助的作用。

在这次重印时，在个别地方作了些修改，書名也略为变动了一下。希望讀者对这本小册子多加指正。

作 者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目 录

一	“实践論”这本书的偉大意义在那里？	1
二	“实践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写成的？	6
三	“实践論”告訴了我們些什么？	10
	（一）实践，对于人們的偉大作用	12
	1. 关于实践性	12
	2. 关于阶级性	18
	（二）人們正确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認識深化运动	26
	1. 感性認識阶段	35
	2. 理性認識阶段	37
	3. 檢驗理論、发展理論的阶段	41
	（三）反对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	46
	1. 关于教条主义	47
	2. 关于經驗主义	53
	（四）改造我們主觀世界的重要性	57

提到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們一定首先記起毛澤东同志的这一部哲学名著“实践論”。用不着說明，凡是学习哲学的人，都应该人手一册，反复研讀。可是，对于初学者，常常出現这样一个問題：怎样才能更好地去研究这本书？更确切地領会它的精神实質？作者曾經学习过这本书，現在仍然还在学习这本书，开始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問題。現在，把我自己如何学习这本书的粗淺体会，如何去掌握書中的精神与重点，如何去联系实际等等問題，写在下面，并且求教于同志們。

一 “实践論”这本书的偉大意义在那里？

毛澤东同志的“实践論”、“矛盾論”，是近代世界上著名的兩部哲学著作，而且是彼此关联的姊妹篇。“矛盾論”透辟地闡述了唯物辯証法的核心，“实践論”則深刻地道出了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骨髓。这两部著作的最宝贵的地方，是在于它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非常成功地运用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解釋了这些原理，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苏联真理报編輯部的論文，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毛澤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論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

在学习“实践論”过程中，我体会到这部書的重要价值有如下几点。第一，「它以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經驗，說明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它強調地指出了辯證唯物主义的階級性和实践性。」它告訴我們：「人們的社会实践——即人們的生产活动，階級斗争，政治、軍事、文化艺朮、科学活动等等——才是人們对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这意思就是說，「离开社会活动，就不会有社会意識，就无所谓真理，更没有办法去判断真理。只有有了社会实践，才产生認識；并拿这些实践去衡量認識是否合乎客观，是否正确。」它还告訴我們：「認識問題的深化过程，也是不断的社会实践过程。」这就是說，人們的思想認識的逐步提高、向前发展，是依靠于人們不断地去从事于实际斗争，在各种实践中取得經驗教訓，丰富我們的头脑，認識也才有可能步步深刻，主觀看法同客观規律才能取得一致。所以，認識是无穷无尽的，实践也就必定是往复循环的。毛澤东同志透辟地說明了实践是第一性的，是决定人們的思想、認識、主觀等等的东西，是一切認識的来源；而人們的思想、認識等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依賴于实践的。根据这个原理，結合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經驗，他指出了我們党的工作的指导原則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对于我們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說来，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工作中我們常常碰釘子，但找不出原因来，說

不出“为什么”来，当讀了“实践論”以后，就很自然地明白了：那多是因为工作中犯了主观主义。为什么会犯主观主义呢？还不是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不合乎客观的工作情况嗎？我們常常說：“脱离实际”，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們一面讀“实践論”，一面联系自己的日常工作想一想，就非常亲切地感到这本书給了我們許多知識和力量。

(2) 第二，讀“实践論”的时候，不仅要把它看成是一部偉大的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應該認識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經驗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在反唯心主义的机会主义斗争中的总结。在我們党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教条主义占統治的时代，它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毛澤东同志领导全党，对那些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展开了严肃的斗争，揭发了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捍卫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不仅把中国革命从危急的环境中挽救了出来，而且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所以，「这部書也就成为我們党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的科学結論，它具有非常鮮明的战斗色彩。」

(3) 第三，“实践論”是指导党的一切活动的思想武器，也是每一个工作同志日常工作中的指南針。因为它是馬克思主义哲学認識論的具体發揮，「它告訴了我們观察社会事物、各項工作时所应当采用的基本立場、观点、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道理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就不致于犯錯誤。」我們回想一下：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以前，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得較慢，保守思想相当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大批

的解散了已經組織起來的農業合作社。可是毛澤東同志立刻出來制止了這種錯誤作法，批判了保守思想，指出了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高潮已經到來，要大家“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果然，不久在全國範圍內，就掀起了一个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農民成區成鄉的加入了合作社，不過一年多工夫，全國就基本上農業合作化了。這裡，我們就可以對照起來看一下：為什麼不少同志產生了保守思想，甚而發生了動搖，想要“下馬”，而毛澤東同志能夠非常英明的批判了這種傾向，鼓勵大家前進去迎接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不相同。我們有些同志在農業合作化中聽到某些農民叫喊：合作社搞得太左了，合作社不如單干好，有的農民鬧着要退社，我們某些領導和幹部不加分析地就相信起來，認為這是多數羣眾的意見，于是不敢辦社了，要“下馬”了。可是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說：要站穩自己的立場，要仔細去分析一下叫喊得最凶的是那些人？不要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事實果然是這樣的，經過調查分析，才証明了叫喊最厲害的絕大部分人是富裕中農、中農和混進合作社內的富農，而貧農、下中農是積極擁護辦合作社的。這樣看起來，階級立場問題對於我們觀察一切社會現象是非常重要的了。此外，拿看問題的觀點來說吧，就更为重要了。“實踐論”告訴我們，一切要從實際出發，要對客觀情況作正確的估計，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犯了保守主義的錯誤，就是脫離了實際，就是對中國農

村情況認識不足；對農民迫切要求組織起來擺脫貧困的熱情估計不足，夸大了合作化的困難同農民的保守落后性；降低了黨的領導作用的信心等等，因而得出了這樣一個錯誤結論：農業合作社大發展的条件不具備，要收縮，要反對冒進。可是毛澤東同志却非常客觀地分析了中國農村的落后經濟情況，中國合作運動的歷史經驗，農民（首先是貧農、新中農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對農業合作社的迫切要求，黨的領導条件等等，就得出正確的結論說：目前農業合作化問題，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不是冒進了而是保守了；不是“下馬”而是要“上馬”。此外，關於分析問題的方法，我們許多同志也帶了不少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去分析問題；或者只看到問題的表面而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看到問題的枝節而沒有看到問題的主体。比如看到剛成立起來的合作社內部還存在一些問題，就夸大的認為合作社不好搞而松了勁；看到某些合作社暫時的減產，就否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看到有一、二戶社員要退社就產生了悲觀失望的心情，因而就想來一個“堅決收縮”。毛澤東同志這樣批評的說：“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①

①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十一頁。

由此看来，正确地树立起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于每一个革命工作同志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只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实践论”，事事尊重实践，尊重客观真理，不要主观任性，不要以感想代替实际，我们就能很好地去观察、分析问题；就能依据上级的工作方针、政策，制定出自己的正确的工作计划，逐步地把工作做好，不犯或少犯错误。

二 “实践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写成的？

①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成的。他写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那里呢？「在于揭露和批判那时不久以前存在在我们党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主观主义。」那时，主观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主要方面的）和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

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

請大家看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一九二七年党内曾經出現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向革命进攻时，由于这条投降路綫，以致党无法組織人民去抵抗反动势力，因而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党又曾經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盲动路綫。这是由于糾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左”倾机会主义泥坑中去了。我們党当时处在一个白色恐怖和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需要正确地去組織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以便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聚集革命力量等待时机。而盲动主义者却不認識这种客观形势，反而錯誤的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質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漲”。因此，不顧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羣众情緒的低落，反而去組織沒有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結果使革命力量遭受到不少的損失。这就是我們党的历史上所認為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

一九三〇年党又犯过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李立三路綫。它的主要錯誤是：看不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遇到革命形势稍为順利一点（苏維埃运动的初步开展，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等）就冲昏头脑，認為全国已具备“大干”的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八〇〇頁。

条件，就錯誤地决定：組織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集中全国紅軍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計劃和行动。这个所謂“全国大暴动”，对于我們党的損害也是非常之大的。

可是，对于我們党的危害最大、流毒最深的还要算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第三次“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即王明、博古路綫了。之所以犯这么大的錯誤，¹是因为教条主义以及与之相唱合的經驗主义，在那时的党内占据了統治地位的原故。²刘少奇同志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这样总结过：“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間統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傾机会主义者，不但沒有接受过去几次錯誤路綫的教訓，而且由于他們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蛮橫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錯誤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們完全不顧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顧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們的錯誤領導，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敗，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統治区的党組織和党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几乎損失了百分之百。”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間王明等同志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表現在那里呢？”³总的一句話，就是他們仅仅滿足于書本上的道理，滿足于理性上的知識，只知道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复述，以及某些公式、教条的背誦，可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却知道得太少；对于当时革命的客观形

勢，又不去作仔細地調查分析，而對於正確的意見，不僅不採納，相反地還予以“無情打擊”。這樣一來，理論同實際分了家，就不能不把革命引到錯誤的道路上去。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到：第一，在政治上，他們不了解中國當時的革命性質和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錯誤地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綫混在一起，並且主觀地想急于跨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害了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這樣，他們就低估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不注意去團結農民；他們也否認中間營壘與第三派的存在，不注意去爭取、團結中間勢力。他們強調反對所謂“農民的資本主義”、“富農路線”，執行了過“左”的階級政策。低估了革命武裝鬥爭的作用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反對所謂“槍杆子主義”，把建立根據地說成是“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第二，在軍事上，看不到當時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卻主觀地強調所謂“正規戰”，軍事戰略上的“速決戰”。在建軍方面，把紅軍當時的三項主要任務（打仗、做羣眾工作、生產），縮小為只是“打仗”的單純軍事觀點。第三，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排斥異己。並且在黨內生活上，用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來對付黨內同志。第四，在思想上，存在着嚴重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他們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活生生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拿去作為俘虜人們的教條。

總之，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客觀形勢，脫離了革命的實際，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

于历史問題的決議”中这样分析了他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

“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的緣故。^①教條主義的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②……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同它合作並成為它的助手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③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的區別，是在於它不是從書本出發，^④而是從狹隘的經驗出發。^⑤”^①

從上面所述事實看來，主觀主義及由此而發展起來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在我們黨內曾經有過市場，曾有一個時期竊據了領導地位，對革命造成了危害，此後又有過深遠的影響。如果讓它發展下去，就會“亡黨、亡國、亡頭”。所以，毛澤東同志領導全黨，在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上，清算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隨後又寫了“實踐論”這本書來對它大張撻伐。^⑥這樣做是為了保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純正，使之不被教條主義者所歪曲，同時提醒全黨注意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性，動員大家來抵制和打倒我們的敵人——主觀主義。^⑦

這就是我們在研究“實踐論”時所需要了解的历史背景。

三 “實踐論”告訴了我們些什麼？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科學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認

①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八八——九八九頁。

認識論的根本原理：存在決定意識；實踐是測量真理的標準。他批判了存在在共產黨內的各式各樣的唯心主義，其中特別突出地批判了教條主義。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有異常深刻的分析，尤其是關於人們的認識深化運動（即人們對於客觀事物認識的發展過程）問題，講得很周密詳盡，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思維（思想方法）方面的科學原理，關於理論與行動（知和行）的關係的科學原理。

為了研究問題的方便，在學習時可大体上把“實踐論”的基本內容劃分成二個部分。在第一個部分中，毛澤東同志着重強調說明了：①實踐，在哲學問題中，在人們思維中，在一切生活活動中的首要地位，他肯定了認識對於實踐的依存關係。簡單地說，就是這樣：如果沒有實踐（各種各樣的人類的活動），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就不會有人們的思想和意識，自然也就決不會有人類社會的演變與發展。所以，實踐就是一切認識的基礎，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動力。當人的認識、思想脫離社會實踐的時候，它就會成為唯心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東西；當認識、思想正確地反映事物客觀規律的時候，它就是唯物主義的、屬於真理的東西，它就會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理論，它可以起反作用於實踐，指導實踐前進。在第二②部分中，毛澤東同志着重說明了人的認識過程和認識的深化運動。人對於客觀事物（特別是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的認識、觀察，不是簡單地象“照象”一樣機械地拍攝、反映和復寫，而是一種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由感覺、

印象到概念、推理、判断的复杂的思维运动。⁷简单地說就是这样：人們要能正确地認識客观事物，掌握事物內在的規律性，并不是單凭“直观”的感觉，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直观只能观察到事物的形式。要接触到事物的本質，事物的核心部分，事物的內在活动規律，就非靠科学的抽象思维不可，就非靠反复多次的認識和实践的过程不可。这个过程，毛澤东同志叫它为認識的深化运动。这个运动，要經歷过三个阶段，即^a第一步感性認識的阶段；^b第二步理性認識的阶段；^c第三步檢驗理論和发展理論的阶段。对某一事物发展的特定过程的全部認識和掌握、利用，大体上是要經過上面三个阶段去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思想深化运动，在万千变化的世界中我們不妨叫它做一个基本环节，把这些环节一个一个的連鎖起来，就可以使我們不断地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为了較系統地領会“實踐論”這本書，我們可以把下面几个問題当成重点，作为学习的入手：第一，实践，对于人們的偉大作用；第二，人們正确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認識深化运动；第三，反对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第四，改造我們主观世界的重要性。

（一）实践，对于人們的偉大作用

“實踐論”指出了辯証唯物主义的兩個特別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实践性；一个是它的階級性。

1. 关于实践性

这一命題，毛澤东同志是把它作为哲学上的一个根本問

題提出來的。他說：“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¹。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①

我們學習“實踐論”，首先就要弄明白這個問題，先有實踐而后有理論呢？還是先有理論而后有實踐？也即是說先有客觀存在而后有主觀意識呢？還是先有主觀意識而后有客觀存在？因為對二者誰在先誰在後的看法不同，就可以區別出誰是唯物主義，誰是唯心主義。哲學上幾千年來思想鬥爭的焦點，也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因此，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¹即是先有實踐而后有理論；物質是先於思維而存在，物質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存在決定意識，意識依賴於存在¹。

科學的唯物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很清楚地闡明了這些原理。恩格斯說：“一切哲學上，特別是近代哲學上最重大的根本問題，乃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

“因之，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即精神與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在中世紀的煩瑣哲學中就曾起了很大作用，這個問題，當着教會面前，竟採取了更尖銳的形

① “實踐論”，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七三頁。